第 52 卷 第 6 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 52, No. 6
2015 年 11 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Nov. 2015

纪念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

编者按:今年是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9 月 15 日,北京大学举办了“新文化运动百年——回顾与展望”纪念大会及高层论坛。现刊发其中几篇论文,以飨读者。

新文化运动与西学东渐

厉以宁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资深教授)

一、新文化运动产生的背景

在西方国家开始工业革命并逐渐实现工业化以前,中国在漫长的岁月中一直是世界上最富裕强盛的国家,成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所羡慕的经济中心。这种情形大约维持到 18 世纪晚期。实际上,就在清朝乾隆皇帝依然盲目自大,瞧不起英国派来的使者时,中国已经面临西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国力日强的压力,但乾隆皇帝对此毫无警觉。从 18 世纪末年起,中国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已经处于落后状态,而且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结果,1840 年爆发了中英鸦片战争,中国被打败,割地赔款,被迫五口通商,洋货涌入。

1840 年鸦片战争后,国内少数人开始觉醒,认识到世界形势已不同于过去。他们提出了“以夷制夷”的主张,主张学习洋务,引进坚船利炮,强军而后强国。但对于中国的体制却依旧麻木不仁。不想改革,也不敢改革。

1894—1895 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终于使中国遭到惨败。中国的失败主要不在于武器装备的差距,因为双方的武器装备基本上是相等的;也不在于国家实力的悬殊,因为当时中国的产值大大高于日本,中国的军队人数也大大多于日本(中国有 100 万军人,日军才 20 万人)。有识之士认为,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是在体制上,中国这时仍然是一个封建专制的王朝体制,而日本经过 1868 年的明治维新,已在体制上进行了改革,可以调动国内民众捐献、参军和努力为前线提供各种军需用品。

甲午战争失败后的中国,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更改体制的必要性的,主要分两派:一派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兴中会(后同黄兴领导的华兴会合并为同盟会),主张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主政府;另一派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主张在开明的清政府的主持下,变法维新,合乎世界潮流。康梁领导的维新派却因自身力量微弱,难以与清朝主政的慈禧太后抗衡。“百日维新”失败了。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也都遭到政府的镇压。八国联军使清政府不得不向列强屈服,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国的苦难大大加重了。

在这种形势下,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政府自己感到再不进行改革,清王朝难以继续统政,于是从 20 世纪初开始实行“新政”,企图挽救摇摇欲坠的清朝统治。然而所谓“新政”并没有真正解决封建专制的体制问题,民众并不拥护这些带欺骗性的改革措施。加之,改革的启动已太晚了。改革的时机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错过,到了 20 世纪初,想变法,想改革,基本上是清政府的一厢情愿的事情,民众都不看好。何况,在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相继去世之后,一些八旗子弟认为大清的江山不能这样丢掉,他们组成了保皇派,想重振清王朝,其实这不过是无法实现的呓语而已。

1911 年 10 月,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发动了武昌起义,占领了武昌。紧接着全国许多省份都举行起义,革命声势之大前所未有。清政府派北洋军南下镇压起义,但北洋军实际上听命于袁世凯。袁世凯估计当时全国的形势,认为这是自己夺权的最佳机会,就在南北议和的过程中,乘机逼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同意给予优待,终于南北

统一,实行共和制,建立中华民国,袁世凯当上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孙中山领导了“二次革命”,因军力不济,失败了。由此开始了袁世凯的独裁政治。

袁世凯既已大权独揽,便授意杨度等名流组建筹安会,鼓吹恢复君主制。1915 年 12 月 12 日,袁世凯通电全国,正式宣布称皇帝,把国号由“中华民国”改为“中华帝国”。12 月 13 日,袁世凯在中南海接受文武官员朝贺,将总统府改名为新华宫,决定从 1916 年起,废除民国年号,改为“洪宪元年”。

袁世凯称帝的消息一传开,引起全国共愤。1915 年 12 月 22 日,云南军政当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出兵讨袁,组成护国军,由蔡锷任总司令,唐继尧为都督。蔡锷率军攻入四川,李烈钧率军进入广西。袁世凯见形势逆转,1916 年 3 月 20 日,被迫撤销帝制。3 月 23 日,他颁令废止“洪宪”年号,仍以本年为“民国”五年,但全国各省都宣布独立,迫袁世凯下台。在这种形势下,1916 年 6 月 6 日,众叛亲离的袁世凯在全国反袁的要求下气急暴亡,临终时口述遗嘱,表示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黎元洪不是北洋军出身,根本指挥不动北洋军,便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从此开始了北洋军阀和其他派系军阀割据称霸的时代。段祺瑞虽然担任了国务总理之职,但他只能指挥一部分军队,他被看成是皖系军阀之首。其他军阀,有直系的曹锟、吴佩孚,奉系的张作霖、滇系的唐继尧等等。1917 年 6 月,一直盘踞于山东的军阀张勋早有复辟清朝的意图,乘此混乱时刻,亲率“辫子军”于 6 月 7 日北上,率领一批遗老和复辟支持者于 6 月 14 日进入北京,16 日张勋秘密进谒逊帝溥仪,并于 6 月 30 日入宫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复辟,宣布北京全城戒严。1917 年 7 月 1 日,张勋把逊帝溥仪扶上皇位发布“即位诏”,宣布恢复旧制,悬挂龙旗,并禁止北京市民非议复辟,违者格杀勿论。北京城一片混乱。

这时,段祺瑞在天津附近的马厂组成“讨逆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并通电全国声讨张勋。7 月 12 日,讨逆军直逼北京,“辫子军”一触即溃,纷纷投降,张勋逃入荷兰使馆,溥仪再次宣布退位。张勋复辟事件平息后,段祺瑞作为北洋政府的实力派之首,幻想一举统一全国。于是 1917 年 10 月 6 日,段祺瑞下令北洋军进攻南军的重要据点湖南衡山、宝庆,并占领了这两个城市。这一事件使南方各省的军队合作援湘,湘军赵恒惕部反击,攻占了长沙。段祺瑞兵败辞去国务总理职位,代总统冯国璋准其辞职,1917 年 11 月任命王士珍为国务总理。于是南北议和,段祺瑞下台后,南北之战停止。

以上所说的就是新文化运动开始前和初期国内政治形势变化的概述。

二、新文化运动的实际领导人

在讨论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日期时,许多人都把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作为标志。《青年杂志》的创刊地点在上海。1915 年 9 月 15 日,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一篇文章,题为《敬告青年》。文内写道:青年人应当从消极、保守、退缩、闭塞等思想影响下解脱出来,树立起积极、进取、追求实利和科学的精神,向腐败的封建意识挑战。文章中明确宣告:任何不合于现今社会的事物和观念,即令它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向,皆一文不值也”。

1916 年 9 月 1 日,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自第二卷第一号起正式更名为《新青年》。陈独秀认为杂志改名为《新青年》更能体现创办这一杂志的目的。他写道:“青年何为而云新青年乎,以别夫旧青年也”“慎勿以年龄在青年时代,遂妄自以为取新青年之资格也”。这表明,作为一名“新青年”,不是年龄合适就行,而必须有新的认识、新的观念、新的作为。

同在《新青年》第一号,还刊登了李大钊的文章《青春》,号召青年人冲破“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立志创造一个新社会、新国家。

在《新青年》第五号上,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他在文中指出,文学改良应当从以下八个方面入手,这就是:

> 1. 须言之有物;2. 不模仿古人;3. 须讲求文法;4. 不作无病之呻吟;5. 务去烂(滥)调套语;6. 不用典;7. 不讲对仗;8. 不避俗字俗语。

胡适还提出,要以白话文为中国文学正宗。在谈到文学的内容时,胡适认为真正的文学应当“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从这个角度来评价胡适,说胡适是“白话文之祖”并不错,但胡适这篇《文学改良刍议》的最重要之处是他认为文学必须反映社会现状,必须言之有物。

陈独秀接着在 1917 年 2 月的《新青年》,刊出了《文学革命论》一文,文中对旧道德、旧文化的开战更为明确。在陈独秀看来,尽管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建立了“中华民国”,标榜民主和共和,但“黑幕未尝稍减”,原因就在于“盘踞我人精神界根深柢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为此,陈独秀自称“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旗上大书特写吾革命军三大主义”。这里所说的文学革命军三大主义是指:

> 1.“推翻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2.“推翻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3.“推翻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陈独秀的这篇《文学革命论》和胡适的《文学革命刍议》的发表,轰动了国内的文化界,被认为是新文化运动的檄文。

新文化运动的开战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关注,从北京、上海到各省会城市,无数青年人都响应《新青年》杂志的号召,投身于摧毁旧文化的影响的口诛笔伐之中。

1917 年 4 月 21 日,李大钊发起组织的中国财经政学会,经京师警备厅备案成立。这个学会是在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的过程中成立的,李大钊等人担任责任会员。它的宗旨是“研究经济学理,调查事实,以期适用于中国”。

1918 年 9 月 15 日,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发表。这是周树人首次用笔名“鲁迅”发表的作品,也是鲁迅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的影响是深远的,它描写了一个“迫害狂”患者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活动。通过主人公“狂人”之口,指责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人吃人”的罪恶社会,预告将来的社会必定“容不得吃人的人”。

综上所述,人们把 1915 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1916 年《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视为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年,是有根据的。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以及其他一些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的学者、名人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也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陈独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旧称“德先生”“赛先生”),很快地掀起了一场思想革命、文化革命,沉重打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礼教、传统道德观,启发了广大群众的民主觉悟、革命觉悟,为五四运动的爆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在这里,必须指出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及北京大学成为蓬勃开展的新文化运动中心的意义。

1917 年 1 月 4 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赴任前,多数友人认为北京大学历来都是官僚主持校务的,这些官僚惯于把北京大学当作官场升迁中的一个台阶,既可沽名钓誉,又可结交权贵军阀,根本没有治好管好北京大学的志向,所以多数友人劝蔡元培不要就任,有碍于自己的名声。也有少数友人认为蔡元培接任北京大学校长是对的,可以借此机会树立新校风,整顿教学秩序。孙中山赞成蔡元培接任北京大学校长。他说:“地方当有革命思想的传播,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教育。”

在深思熟虑后,蔡元培慨然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改革学校的领导作风,充实学科、学制,倡导平民教育,首行男女同校。他采取“兼容并包”方针,大量引进新派人物,不拘一格招聘专家。在蔡元培校长倡导下,北京大学开创了思想自由的新风。蔡元培支持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倡导重民主、重科学的新思潮。

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校务期间,陆续聘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有名望的人来北京大学。这时《新青年》也由上海迁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编辑部为核心的新文化阵营。

在蔡元培领导下,“德先生”(民主)和“赛先

生”(科学)两大旗帜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关于民主的含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认为它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民主精神和民主思想,包括个性解放、人格独立、民主自由权利等内容;二是指反封建反专制,认为中国要在今日的世界生存,必须放弃几千年来的专制、官僚的统治,改为自由、自治的国民政治。关于科学的含义,也应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阐释,一是反对封建迷信,反对不科学的种种旧观念,二是向西方国家学习科学技术、科学知识,尊重科学,具有科学精神,解放思想。

在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中,新文化运动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即新文化运动的初期,主要是以西方资本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新文化在第一阶段内,许多人的心目中仍然推崇资本主义新文化,并想以此代替封建主义旧文化。他们希望把中国改造为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二阶段,即新文化运动的后期,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参与者出现了分化。一部分人依旧认为可以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搬入中国,主张要把资产阶级民主体制在中国的建立和推广作为目标。但另有一部分人则认为,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移入中国未必符合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改革可能有其他出路。

李大钊 1918 年 11 月 15 日在北京天安门的演讲和在《新青年》1919 年 1 月发表的文章,被认为是探索新路的代表作。李大钊在天安门的演讲会是北京大学主办的,演讲题是《庶民的胜利》。李大钊在演讲中说道:“协约国战胜了,同盟国战败了,世界大战结束了,这是‘公理战胜强权’。”他认为,取得这次战争胜利的不是协约国的武力,而是人类世界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国的资本家的政府,而是全世界的庶民,胜利是“庶民的胜利”。这篇演说发表于 1919 年 1 月的《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上。在同一时期的《新青年》上,还发表了李大钊的另一篇文章《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篇文章热烈赞扬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预言“人道的警钟响了! 自由的曙光出现了! 试看将来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8 年 11 月 16 日,蔡元培校长在北京大学生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发表演说。他认为“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他还说:“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他的结论是:“要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

这些都表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预示着分化的加速。一些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怀疑的人日益倾向于探寻新路。1919 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得新文化运动中一部分人在新路上走得更远,变得更加激进。

四、“五四运动”的由来及其伟大意义

1919 年 1 月 21 日,中国以战胜国身份派代表团参加在法国巴黎举行的凡尔赛会议。1 月 27 日,会议讨论山东问题,日本拒绝交还所夺取的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并认为日本应当继承德国的权利。英、美、法等国竟不顾中国代表团的要求,把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给予日本。消息于 1919 年 5 月 2 日传回北京,举国上下,无不震惊。5 月 3 日,北京大学学生紧急集会,并同其他高校学生商议后决定于 5 月 4 日举行大游行。

果然,5 月 4 日一早,北京大学和其他 13 所高校的学生一共三千多人,在天安门前集合,然后举行示威游行,拒绝在合约上签字,下午约 4 时,游行队伍到达赵家楼曹汝霖住宅(曹汝霖时任交通总长,被学生认定是亲日派),痛打了刚从日本回国的驻日公使章宗祥,还火烧曹汝霖住宅。军警赶到现场,拘捕学生 32 名。5 月 5 日,为抗议政府抓捕学生,北京各高校学生实行总罢课。

5 月 6 日,天津、济南、上海、武汉、长沙、广州等地的民众、学生纷纷示威游行。5 月 7 日,被捕学生被释放。为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上海、天津、武汉、长沙等地纷纷成立了学生联络会。但北洋政府仍继续逮捕上街演说的学生。1919 年 6 月 4 日,北京学生被捕的消息传到各地,从上海开始,全国 20 个省共 100 多个城市都举行罢课、罢工、歇业等活动,不仅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还要求罢免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三名亲日派的职务。

迫于群众的压力,除了陆续释放各地被捕学生而外,大总统徐世昌不得已免去曹、章、陆三人的职务。

至此,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已不再限于文化、伦

理问题。中国有觉悟的青年人、包括一些中年人,已经从五四运动中懂得一个道理:只有组织起来,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并进而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国才有希望。这就为 1921 年 7 月成立中国共产党准备了条件。

五、1915 年以后新文化运动的特色

西学东渐是新文化运动开展以后带来的必然的结果。尽管早在 19 世纪晚期中国清朝政府就已经派出赴西方国家学习的留学生,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又派遣了大批留学生赴日本学习。此外,自费留学美、欧、日的学生也越来越多,所以西学东渐远不是 1915 年新文化运动开始才出现的现象。

19 世纪晚期到 20 世纪初,清朝政府已经派出多批留学生到英、美、德、日等国家去学习,还聘请外国专家前来中国讲学或担任某一部门或单位的顾问,这可以称作西学东渐的一部分。但与 1915 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中的西学东渐相比,二者有以下四个重大的区别。

第一,19 世纪晚期到 20 世纪初派出的留学生,主要是清政府或地方督抚所派遣的,以学习技术、军事为主,并没有把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作为学生引进的意图,如果有,那也只是一部分留学生的个人行为。而 1915 年新文化运动开展以后,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由各省所派遣的留学生,多多少少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开始关心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方法和精神的引进。这是前所未有的。

第二,在 1915 年以后,留学回国的学生中有愿意从事教育的,一般都能如愿以偿,因为从北京、上海到各省,都有发展教育,培育人才,开发民智的愿望。无论是北京或上海,还是各省会城市,都新设立一些高等学校、师范学校或高中。所以回国任教的留学生有了用武之地,他们把课堂当作了西学东渐的讲坛。这种情况在 19 世纪晚期到 20 世纪初,是不多见的。

第三,从 19 世纪晚期到 20 世纪初,尽管清政府和各省都派出了去美、西欧和日本的大批留学生,他们回国后在技术部门、工程部门和管理部门也担负了一些职务,他们也把西方学说引进了中国,但他们既没有形成一个学术中心,也没有一个类似的组织作为发动群众的中心。简单地说,他们依然是一盘散沙。新文化运动开始后便不一样,《青年杂志》和以后更名为《新青年》的编辑部,便成了动员人们、发动人们的中心,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变成了这一运动的组织者,或者说是筹划者。在《新青年》杂志以外,还有北京大学这样一个中心。自从蔡元培担任了北京大学校长以后,北京大学既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心,又成为新文化运动后期的指挥所。《庶民的胜利》这篇文章是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在天安门前举行的公开演讲会上的讲稿。为庆祝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而发表在《新青年》。1919 年 1 月号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作者同样是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1919 年 5 月 4 日以北京大学学生为首的北京各高校学生大游行震撼中外,被誉为“中国人觉悟了!”的游行过程中,一些学生被捕,又是以北京大学学生带头的学生罢课,游行抗议,以及由蔡元培校长带头同北京警察部门交涉要求立刻释放学生。在 19 世纪晚期 20 世纪初,根本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第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在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以来,知识界、思想界、文化界、教育界的阵线越来越清楚了。他们之中大体上分为三种倾向:一部分正在积极探索如何建立共产党,走马克思主义道路,他们认为中国社会必须经过工农革命,建立新社会才能振兴,才能实现富强、自由、平等、公正。当时正在酝酿留法勤工俭学的方案,一批又一批有志之士,希望通过勤工俭学能到西欧国家去接受马克思主义。此外,也有少数通过西伯利亚到达莫斯科去领悟俄国十月革命成果的。这些人中,不少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追随者。

另一部分选择了广东,因为孙中山和孙中山的支持者历经挫折,终于在广州站稳了脚跟,国民革命的宣传得到不少人的支持。与北洋政府相比,广州代表着一条新路、一种希望。参加过新文化运动的或参加过五四运动的人,拥护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有些就南下了。

还有一部分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始终关心文化和学术的探讨。他们投身于文化界、学术界,

成为继续从事新文化使命的学者。

真正想在北洋政府及其机构中工作的人是极少数。

六、对“五四”前后西学东渐的正确评价

关于 1915 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以及由此掀起的西学东渐的热潮,并未因五四运动的结束而停步。两个对引进国外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十分有利的条件已经具备:一是除北京和上海外,大多数省会城市从这时起新建了一批大学,建校经费或来自中央政府、各个地方政府,或来自教会或其他公益机构,或来自商界的赞助。从而一些重要的省会城市竞相吸纳人才,振兴学术,其中包括研究、引进和讲授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日本)的科学思想和学说;二是各地新创办了一些杂志,或成立了一些学习研究性的团体,它们聚集了一批有志于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新学说的知识界人士,默默地从事“向西方学习”“向新思想、新学说学习”和推广各自学习心得的工作。

例如,1918 年 12 月 22 日,陈独秀、李大钊在北京创办了《每周评论》。陈独秀在发刊词中写道:“我们发行这《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字,只希望以后强权不战胜公理”“强权不战胜公理,便是人类万岁! 本报万岁!”《每周评论》主要宣传反封建、反军阀统治、反帝国主义的思想,介绍十月革命,介绍社会主义学说。杂志主要撰稿人除陈独秀、李大钊以外,还有张申府、胡适、周作人、王光祈等人。

又如,1918 年 10 月,由江苏省教育厅、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暨南学校、中华职业教育社联合组织的中华新教育共进社发行的《新教育》月刊于 1919 年 2 月在上海创刊,由蒋梦麟任主编。《新教育》提倡平民教育,提倡白话文,主张建立以地方自治为基础的民主共和国。

再如,1919 年 3 月 23 日,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在北京大学宣布成立,邓中夏、廖书仓为总务干事。平民教育讲演团在北京城内设四个固定讲演场所,讲演内容包括反日爱国、民主政治、破除迷信、反对封建家族制度、提倡科学和文化等。

接着,1919 年 7 月 1 日,王光祈、李大钊等在北京成立少年中国学会。该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该会有成员 42 人,王光祈担任会长。此后,支持该会的人士要经过该会会员五人介绍,才能加入。

在北京以外,天津的进步青年由周恩来、郭隆真、邓颖超等人发起,由天津学生联合会、女界爱国同志会于 1919 年 9 月 16 日组成了“觉悟会”,并开始出版不定期刊物《觉悟》杂志,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

1920 年,恽代英、林育南等人组织成立了武汉利群书社,社址定在武昌横街头 18 号。书社经销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激进书报杂志,影响不少青年。武汉的新潮小团体的成员大多数加入书社,书社很快成为武汉激进团体的联合组织。

在这里还应当提到 1918 年 4 月 18 日在长沙组成的新民学会。早在 1915 年秋季,即新文化运动刚开始之际,毛泽东写了一则征友启事,寄给长沙各校。不久,在他周围聚集了 20 多位志同道合者。1917 年冬,他们决定成立“新民学会”。1918 年 4 月 18 日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下蔡和森家中,召开新民学会成立大会。基本成员共 21 人,包括发起人毛泽东、蔡和森以及何叔衡、张昆弟、罗章龙等。会议通过了“新民学会”会章。会章规定,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1920 年 7 月 6 日,“新民学会”旅法会员在法国蒙达尼召开会议,参加者有蔡和森、向警予、蔡畅、李维汉等 20 多人。会议确定了“新民学会”的方向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蔡和森主张建立共产党,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同年 8 月 13 日,蔡和森从法国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主张组建中国共产党,争取国际无产阶级援助。12 月 1 日,毛泽东复信蔡和森,对其主张极表赞同。

这时,1920 年 10 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等人在北京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早几个月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为北京大学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的一个群众组织。1920 年 11 月 17 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出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启事,公开了该学会活动的消息和发起人名单,其中有李大钊、高崇焕、王有德、邓中夏、罗章龙、吴汝民等 20 人。

正当中国国内酝酿着组建中国共产党之时,

1920 年 4 月共产国际代表团抵达北京,由俄共党员维金斯基率领。维金斯基抵京后,着重同李大钊等人讨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在这之前陈独秀为逃避北洋政府追捕,已于 1920 年 2 月在李大钊护送下,扮作商人,乘坐骡车至河北乐亭李大钊家中暂避,然后赴天津。陈李二人在途中已讨论过筹建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并约定在北京和上海分别筹建。陈独秀随即到了上海)。维金斯基在与李大钊洽谈后表示:在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以及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已经成熟。李大钊同意维金斯基的意见,介绍他到上海与陈独秀见面。此后,维金斯基即逗留上海帮助陈独秀筹备中共建党工作,并把大批马列主义书刊传入中国。

至此,为一年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举行准备了足够的条件。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李汉俊家中秘密召开。到会的正式代表有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东京小组的周佛海,另有陈独秀的代表包惠僧。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尼柯尔斯基也出席了大会。7 月 30 日,李汉俊家受到法租界巡捕注意。31 日,大会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继续开会并在此闭幕。大会确定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大会选出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组成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李达、张国焘分别负责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

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和闭幕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开始了中国政治新阶段。

回顾 1915 年新文化运动的开始,经过六年时间,新文化运动带来了丰硕的成果:中国人民觉悟了,领导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了。

对 1915 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的评价既已清楚,那么对新文化运动期间的西学东渐的评价也就不言自明了。对于西学东渐(包括 19 世纪晚期到 20 世纪初,以及 1915 年新文化运动展开后的西学东渐),应当有科学的、正确的评价。

本文前面已经指出,引进的西方国家的学说,既包括自然科学的,也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的。如果是指自然科学,尽管在 19 世纪晚期到 20 世纪初引进的并不多,但毕竟引起国内的重视,引进这些自然科学的知识、方式和科学精神都有助对国民的启蒙。这里并不存在有碍于文化建设、教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问题。如果是指人文社会科学,那么这个时期引进的西方学说一直偏重于文学名著的汉译。把西方的文学名著介绍给中国,使国人能了解西方的社会情况,拓宽了国人的视野,并有助于中西文学交流。再以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的经典著作《原富》(即《国富论》)而言,这是一部主张经济自由主义并批判重商主义、批判国家对经济干预过多的古典经济学名著。严复从 1896 年提笔翻译,历时五年译完《原富》,该书分上下两部于 1901 年、1902 年出版。然而这本书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究竟发生了多大的震动,很难说。要知道,严复是以古文译著的,一般人不感兴趣,也读不懂。即使有些读者,他们也没有想过这是一部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作,至多把它看成是一本教授人们如何理财、如何省钱赚钱的读物而已。所以《国富论》中译本《原富》的出版,在中国社会的影响是不大的。

1915 年新文化运动开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自然科学方面,随着 20 世纪初以来派遣到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学习自然科学人数的增加和回国的学生人数的增加,从事自然科学教学、研究、职业的人数也不断增多。他们把在留学期间学到的自然科学知识、方法和科学精神带回国内,使之传播,扩大影响,对于人才培养起了很好的作用,对中国社会也起了积极的作用。这是不可抹杀的。

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从新文化运动开展以来,西学东渐的影响的扩大可能更加引人注意。这是因为,新文化运动的反帝反封建色彩,使一批又一批想改革社会的人,抛弃保守、另辟新路。他们渴望从西方国家和日本新出版的书籍和报刊上找到自己需要的知识,他们更希望有一个选择的机会,因为只有通过选择才能找到目标和通向目标的途径。

参与新文化运动的人,包括无数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教育而认真考虑下一步中国将向何处去

的人,以及对东渐的西学提出该如何选择的人,是不会感到失望的。国外传入有关社会科学的各种学说中,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村社社会主义,还有马克思主义。中国的进步青年在这些学说中终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当时对人们最有吸引力的,不是其他著作,而是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当时进步青年对于新路的认识尽管不一样,但“走十月革命之路”却成为人们向往的道路,这同样是选择的结果。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说明新文化运动过程中“西学东渐”的意义。

即使人们当时对引进的西方国家和日本出版的法律学、政治学、教育学和经济学的书籍的兴趣日增,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要知道,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后,国内的改革旧传统和创建新社会的呼声日益高涨,反帝反封建的赞成者和支持者的人数越来越多,人们对东渐的西学的兴趣也越来越大。由于目标是反帝反封建,所以法律学、政治学、教育学和经济学书刊也越来越受到欢迎,这里就包括了介绍这些内容的书刊。这并不违背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只要不是宣传封建帝制,不是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封建专制主义歌功颂德或竭力辩解的,只要是称赞民主、自由、平等的西方书刊,都会有读者。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应当正确地看待当时的西学东渐,不能由于引进中国的西方国家出版物中有介绍资产阶级法律学、政治学、教育学和经济学的书刊而贬损西学东渐的作用。换言之,1915 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主流是否定旧文化、旧思想、旧伦理,引进的资产阶级法律学、政治学、教育学和经济学,不仅有助于开拓国人的视界,而且其中仍有不少内容可供刚成立的民国政府立法、行政管理、学校建设作参考的。

再以经济学的引进来说。1915 年前后,在西方国家占主流地位的是新古典学派,无论是新古典学派的大本营英国,还是接收新古典经济学的美国,都以完善市场经济,鼓励市场竞争,反对国家垄断为基调。当时留学英美的中国留学生所学习到的经济学说,都是新古典经济学。中国的市场是不完善的,市场的完善和发展受到很大胜利,私营工业企业受到的限制更多,其中既有政府的限制,更有帝国主义国家资本的特权的存在,而且中国劳工的地位得不到保障,这些都是不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本意的。因此,在中国国内各高等学校内讲授当时占主流经济学位置的新古典学派的学说,也有对人们的启示作用,所以不应当一笔抹杀引进新古典经济学说的作用。

除此以外,还应当看到,经济学中有不少实用的内容。例如,财政的管理(包括国家预算应力求平衡,国际收支也应维持基本平衡)、金融的管理和风险的防范、证券市场的建设和运行、工业企业的投资和经营、国际贸易的开展、城市化、农村人口的流动、市场秩序的维护等,都是经济发展所不可缺少的知识。中国经济今后应如何健康发展,如何参与国际贸易和海外投资,需要一大批专业人才。因此,在西方经济学知识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国的政界、法学界、经济界努力学习和了解西方经济的组织和法制化过程,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在评价西学东渐时需要注意到的。总之,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的重大功绩,包括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之一的西学东渐,都应当放在当时的大环境中去评价,这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

(本文写作过程中,有关新文化运动中突出事件的日期和经过,参考了广州市文化传播事务所主编的《20 世纪中国全纪录(1900—1994)》,执行主编吴少秋、陈方远,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5 年版。)

(责任编辑　郑　园)